

走筆紅土地

Z O U B I H O N G T U D I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傅伯言 著

Z O U B I H O N G T U D I

走笔红土地

傅伯言◎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笔红土地/傅伯言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8

ISBN 7-210-03452-8

I. 走... II. 傅... III. ①地区经济—经济发展—
江西省—文集②社会发展—江西省—文集
IV. F127.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4092 号

走笔红土地

傅伯言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9.625 字数:200千

ISBN 7-210-03452-8/F·568 定价:25.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E-mail:jxpph@163.net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责任编辑 徐建国
封面设计 揭同原

自序

江西,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军队的摇篮、共和国的摇篮、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都是在这里,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江西的骄傲。这是中国的骄傲。同许许多多的人具有红色情怀一样,江西这片红色的土地,也时刻牵动着我的情思和文思。这本《走笔红土地》,就是这种情思和文思的多年积淀,也是我在江西省社联、江西省社科院十年期间一次阶段性的学术“盘点”。

顾名思义,走笔红土地,就是在红土地上写的文章,就是写红土地的文章。全书一共收进了三组文章:第一组6篇,是关于几个“重大题材”的调查研究;第二组10篇,是关于“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的个案调查;第三组7篇,是关于江西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最后的2篇“附录”,也是同全书有逻辑关联的。

“经世致用”,是我们的古人定下的一个治学法则。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就是要以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

2. 走笔红土地

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服务。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天职。

我在省社联、省社科院工作期间曾经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要“与时代同步,与党和政府的决策意图合拍,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脉搏一起跳动”,江西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江西,紧贴江西,研究江西,服务江西”。回头看看,此言不谬。在省社联、省社科院的十年(特别是近五年)间,我更多履行的是省社联主席、省社科院院长的职责,大量的时间用在谋划省社联、省社科院的改革、发展、稳定上,用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组织工作上。为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省社联、省社科院出台了“资深研究员制度”、“首席研究员制度”、“学术带头人制度”和“重点学科建设制度”,实施了“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文库”工程。为了当好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省社联、省社科院同省委宣传部一起,组织了多次全省重大课题招标,由我领衔的中标课题和向省委、省政府呈报的对策研究系列报告(这些文章在传统的文体分类中叫做“策论”),总共不下几十篇,约有几十万字,省领导在这些材料上的肯定批示有90多个。这些“策论”,都是集体成果,虽由我领衔,但个人亦不敢掠美,因此在这本集子中,一篇未收。尤其令人难忘的是,2001年5月10日省委在省社联、省社科院召开的专家座谈会,2001年11月13日省政府在省社联、省社科院召开的经济发展专家咨询座谈会,开了全省“专家论坛”的先河,带起了全省的“论坛热”。所有这些,我能够恭逢其盛,参与其中,在深感荣幸的同时,自以为不过尽了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为

“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服务的“本份”而已。

与此同时,我也不能不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责任。我的方法是,忙里偷闲,就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就一些重大实践问题进行调查及理论思考。日积月累,也发表了几十万字,结集在《走笔红土地》中的文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比起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我深感惭愧。但想起这些年来自己忙里偷闲的努力,心里倒也还有几分欣慰。

从学生时代以迄现在,我就认定了一个道理:腐儒无用,学究无文。理论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一个学者不能满足于在“象牙塔”里做文章,而必须自觉地贴近实际,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接地气”。即使是“纯学术研究”,可以搞“阳春白雪”,但不可谈“玄”。古今文章,都是由实践和时间来检验其生命力的。我以此自勉。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在《江西诗词》十周年纪念会上写的一首贺诗,诗云:“老来常怀壮士心,何曾息鼓罢歌吟。不似冯驩怨弹铗,依然浩歌唱入云。”这是我在中年时代写给那些从事古体诗词创作的老同志的,如今思之,倒有些“夫子自道”的意味了。其实,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人生的意义,现在退出了领导岗位,仍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对事业的追求却应该与生命相始终。事业,可以延伸生命的长度;事业,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事业,可以提升生命的高度。致仕之后,学术研究、书法创作就成为我的另一种生活状态了,这也算是我对生命意义的另一种诠释吧。

4 走笔红土地

《走笔红土地》中的部分文章,是与我的一些同事合作的。我真诚地感谢在工作上和学术研究上支持和帮助过我的同事们。

江西人民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主持该社工作的徐建国同志亲任本书责任编辑,我同样真诚地表示感谢。

傅伯言

2006.7.12

目
录

自序	1
他们走出了绝对贫困的沼泽	
——对毛泽东《兴国调查》中有关人员后裔情况的再调查	1
江总书记走访过的8户农家生活变迁及启示	18
把思想政治工作当作天大的事来做	
——关于南昌市思想政治工作的调查	38
讲政治是具体的	
——关于宜春地区“三讲”教育的调查	49
一项福泽万民的德政工程	
——江西移民建镇工程调查	69
关于“加强思想道德和纪律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的研究报告	78
一次不经意的调查及其引出的思考	90
一个市委书记的素描及其他	95
“弄潮儿向涛头立”	101
为了“心里搁不下”的责任	113
“把自己逼到虎背上去”	
——兴国调查	134

“在市场竞争中,没有我们歇脚的地方”	
——“江西移动”调查	155
读贵溪	175
在安义所看到和想到的	195
说资溪	211
“十一五”:拿实绩说话	
——丰城调查	222
在不争论中发展 在不折腾中前进 在不 甘落后中奋起	243
“江西应当在中部地区崛起中有更大的作 为”	246
新世纪新阶段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基 本分析和判断	250
弘扬井冈山精神,加快江西崛起	255
井冈山精神——具有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	258
加快发展的精神动力	263
关键在党 希望在党	266
附录:	
1.关于浙江经验的理论思考	275
2.关于新加坡管理经验的几点哲学思考	288

他们走出了绝对贫困的沼泽

——对毛泽东《兴国调查》中有关人员后裔情况的再调查

1930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指挥第一次反“围剿”的倥偬中,与8位农民家庭出身的兴国籍红军战士座谈一个星期后,写下了著名的《兴国调查》。毛泽东同志说:“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这8位红军战士家住兴国、赣县、万安三县交界处的兴国县永丰区。毛泽东同志选择他们为调查对象是因为:“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这说明8位红军战士的家庭在当时的赣南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时隔半个多世纪后,这8户农民家庭后裔分别居住的兴国县永丰、均村两个乡,属于交通落后、经济基础极差、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极低的贫困的边远山区,在我国贫困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8户农民家庭又是当

年毛泽东同志的调查对象,是红军烈士的后裔,因而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上的特殊性。为了掌握他们的家庭生活变化,了解老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运行轨迹,江西省社联等部门将这8户农民家庭作为定期观察、研究对象,并于改革开放后的第10年,即1988年,和改革开放20年后的1998年,进行了两次详尽的调查。

惊人的结论:58年过去,旧貌未换新颜

兴国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将军县”。除《兴国调查》外,毛泽东同志在兴国还写下了《长冈乡调查》,主持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兴国土地法》。在战争环境下,对一个县的情况进行如此多的调查,在毛泽东同志生平里是不多的。兴国因其具有的特殊地位,解放后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在改革开放成果辉煌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的同时,人们尤其关注兴国人民及《兴国调查》中8户农民家庭后裔的生活状况。1988年,江西省社联调查组怀着对老区人民崇敬的心情,走访了《兴国调查》中的8户农民家庭后裔。情形令人吃惊和叹息:距1930年58年,解放39年,改革开放已十年,兴国仍有20万人处于绝对贫困之中,这8户农家就是其中的代表。1987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463元,江西省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406元,这8户农民家庭后裔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65.3元,离当时江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还差34.7元。与解放初或改革开放前比较,他们的家庭经济生活水平几乎一样,有些方面甚至还不如1930年毛泽东同志调

查时的状况。其一,新一辈与老一辈一样生活艰难,经济状况极差,生活工具不齐全,一年劳作难以糊口;其二,口粮严重不足,借债度日的生活与老一辈一样。这8户农家人均每天不到0.9斤大米,1987年缺粮共7400余斤,为了糊口几乎家家还需借债购粮。8户家庭除一户未借债外,其余共借3530元,户均504.3元;其三,新一辈与老一辈的文化素质相近,没有什么差别,调查的新一辈9人平均读书5.1年,比当年毛泽东同志的调查对象平均少受教育0.15年;其四,新一辈与老一辈的生产、生活条件几乎无差别。田、路、居住的房屋与当年基本一样,且山上的树比过去少了……《兴国调查》中的8位农民家庭新一辈与老一辈的生活基本一样,以致调查组百感交集地做出“今昔相比非常接近,旧貌并没有换新颜”的结论。有关媒体披露这些情况时,加上了醒目的标题:“58年过去,旧貌未换新颜。”这样的调查结果确实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首先,中国的国情决定消除贫困的进程只能是渐进式的、优先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及地区间经济的不平衡性,导致了不同地域的农民生活水平自然有所不同,一个村,甚至在同一个人农民家庭,因劳动力素质、人口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成员也存在贫富差别。《兴国调查》中的8户农民家庭后裔,恰恰就是属于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消除贫困相对滞后的农民,同他们境况一样的农民,1987年全国还有1.25亿,江西也有600万,兴国还有20多万。其次,自然环境的恶劣,战争创伤的影响,是制约老区摆脱贫困的最大障碍。

老区之所以能成为主要的革命根据地,很大的原因在于它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有助于抵御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但在今天,战争年代的地域优势已成为制约老区经济发展的劣势,无形之中加大了经济建设成本,阻滞了经济建设的步伐。此外,战争带来的创伤也是在几十年内难以治愈的。兴国当年参加红军的,多是青壮年,有一些文化知识的人都走了,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茅草过火石过刀人换种”的血洗,兴国经济大伤元气。解放后,党和政府对老区十分关怀,兴国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属贫困地区。十几年“输血式”扶贫虽救了老区农民的一时急,但未消除他们中很多人的一世穷,相反还增长了他们中一些人的依赖思想,年年要救济、吃补助。扶贫政策没有有效地引导、促进他们去与贫困决战,贫困相伴也自然是年复一年。再次,农业有一个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的过程,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很大,使农业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加上长期形成的“剪刀差”,使以粮为本,与工、商、贸无缘的8户农民家庭后裔难以种粮致富。“种田为肚皮,养猪为过年,养鸡养鸭换盐钱”就是他们的生活写照。几十年一贯制的产业结构自然导致他们几十年的生活状况不会有大的改变。再就是土地逐年贫瘠,人地关系紧张。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兴国水土流失由来已久。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248.86万亩,约占山地总面积的84.78%。1980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世界经济委员会顾问佩雷拉·查理斯爵士面对这一情况,深有感触地说:“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如不及时治理,兴国就要‘亡’国。”这8户农

民家庭后裔多数家住在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农田肥力下降,地温升高,对他们直接的影响是粮食产量停滞不前。这时期他们同其他兴国农民一样,处在“山上无树,地上无皮,田中无肥,灶前无柴,仓中无米”的困境中。此外,更为突出的问题是人口激增,导致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1930年分田以后,8户农民家庭共51人,人均耕地1.2亩,1987年这8户农民家庭人口翻了一番达111人,占有耕地59.7亩,人均耕地下降到0.54亩。到1987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七八年了,多数农民吃饭问题已解决,为何这8户农民家庭还吃不饱,年年要借粮呢?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这8户农民家庭人口的倍增抵消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增长,以致他们“吃粮状况”竟与1930年分田前的状况差不多。最后,8户农民家庭后裔文化素质低下,思想守旧。第二代中只有两个人是初中毕业,其余的都是小学毕业。解放初有关部门曾推荐他们中的一些人以烈士子弟身份免费上学,竟被他们放弃。文化素质的低下,导致他们小农意识浓厚和缺乏创业精神。这8户农家第二代中有篾匠、泥工、裁缝,有的还会开拖拉机、抓甲鱼,在农村中属于有一技之长的人,但他们都没有发挥特长,发展家庭加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兴国众多的“打工仔”、“打工妹”南下邻近的粤、闽,除养活自己外,还给家里寄回大量现金,往往是“一人打工,全家脱贫”。而他们却无动于衷,没有一人外出打工。在这一点上还不如他们的父辈。当年这8位农民所属的家庭在土地斗争中分了田,废了欠的债,他们“叨红军的恩典”,“百物都便宜”,每家至少有1

人踊跃参加红军和赤卫队。今天在和平环境下,他们竟不愿意走出家门艰苦创业,他们的生活怎会有大的改变?“旧貌”又怎能换上“新颜”?!

期望的结果:又是 10 年过去,旧貌终现新颜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对老区、贫困地区人民的关心,中国的贫困人口逐年减少,由改革开放前的 2.5 亿,下降到目前的 5000 多万。《兴国调查》里的 8 户农民家庭后裔,同兴国 20 多万贫困人口一样,终于在 1988 年以后的 10 年里,先后走出了绝对贫困的沼泽,比现有的全国几千万贫困人口率先走上了奔小康的大道。短短 10 年创造了 58 年没有创造的奇迹,短短 10 年改变了 58 年来没有改变的旧貌。

——58 年中没有消除的绝对贫困,在这 10 年里终于被消除。早在 1994 年,这 8 户农家后裔年人均纯收入 1000 元以上的有 6 户,最高的 1 户为 1964.6 元。最低的 1 户只有 565.9 元,仍在贫困线上徘徊。1995 年这些家庭年人均收入达到了 1450 元,比 1987 年增长了 8.77 倍;1997 年这 8 户家庭后裔全部摆脱了绝对贫困,收入大幅度增加。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为 3151 元,最低的也有 910 元,其中 1000 元以上的就有 7 户。这 8 户家庭后裔年人均纯收入已达 1816 元,高于全县同期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全县为 1751 元),较 1987 年增长了 11 倍,10 年内年均递增速度为 26%,远远高于全省同期递增速度。

——58 年中没有解决的“吃饱”问题在这 10 年里解

决了。1987年这8户农民家庭后裔共收粮食53320斤(含杂粮),人均只有480斤左右,家家粮食不够吃;1994年8户农民家庭共收粮食总产量为54267斤(不含杂粮),人均占有粮食705斤,分别比1987年增长2%、47%,家家粮食都够吃;1997年8户农民家庭共收粮食总产量达57700斤(不含杂粮),人均占有粮食759斤,基本上家家有余粮,分别比1987年增长了8.2%、58%;且人均占有粮食高于全县农民同期平均水平(全县为726斤)。若再加上长年在外从事劳务的人员省下的口粮,人均占有粮食达到了1000斤。粮食产量的提高,对这8户农民家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几十年没有解决的“吃饱饭”问题,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二是减少了购买粮食的支出,等于提高了他们的经济收入;三是基本上每户人家都有余粮从事养殖业,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大幅度提高现金收入有了前提。

——58年中几乎没有改变的居住环境、生活质量,在这10年里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和显著提高。1987年,这8户农民家庭后裔的住房有的是解放前建的,有的是土改时期建的,几乎都是潮湿、阴暗、破旧的土坯房,有的还难以遮避风雨严寒。10年后,这8户农家的后裔除1户建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住房只是重新修整外,其余的家庭都普遍盖了一两次新房,人均住房面积达24平方米。他们的房屋有的是砖混结构、有的是土木结构,有一户人家还安上水泵,将山泉水引进了家门。这些住房造价一般要花费两三万元人民币,高的多达七八万元,这在温饱都没有解决的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8户农民家庭后裔生